

王毅再访欧 双边合作“示范”中欧互动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继璇
记者 赵安琪

应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卡西斯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10月7日至12日访问意大利并召开中意政府委员会第12次联席会议、赴瑞士举行中瑞第四轮外长级战略对话。这是他9月中旬访问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波兰三国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再次出访欧洲。

在中意建交55周年和中瑞建交75周年的重要节点，面对正在对华关系上“校准方向”的意大利和长期保持“战略对话”的瑞士，中意、中瑞双方将如何延续务实合作？身处逆境中的中欧关系将如何稳步前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双边合作产生的示范效应，能为中欧关系注入新动能。



2025年10月8日，中意政府委员会第12次联席会议在罗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左）同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共同出席。图片来自外交部



2025年10月8日，中意政府委员会第12次联席会议在罗马举行。图片来自自外交部

和两国人民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意大利时政评论平台 Formiche 网文章认为，王毅外长本次访问会为“意中双边关系议程带来新进展”。文章称，近几个月来，意大利政府在处理中意关系时持续释放“平衡信号”，呼吁保持合作而非正面冲突。

在本次联席会议中，塔亚尼也强调了意中关系的重要性，并表示经贸合作是意中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希望双方通过双边机制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落实好三年行动计划，同中方扩大传统和创新领域相互投资。王毅也指出，中方愿同意方积极发掘绿色、数字、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

“在这些新兴合作领域，中方不仅有产能优势，也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崔洪建分析说，这些领域恰恰也是多数欧洲国家未来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中意双方合作的实践效应或许能帮助欧盟改善其规则体系，“近两年来，欧盟内部对其产业、投资、贸易等方面的限制措施，也有不同程度的批评声音。因此，如果中意双方能

在新兴领域实现合作突破，也有助于改善中欧的整体合作框架”。

瑞士：中瑞自贸升级“加速跑”

在瑞士方面，虽然瑞士并非欧盟成员国，但其在国际金融、产业创新等领域都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从这个角度出发，崔洪建认为发挥中瑞合作的示范效应非常重要。

2013年，中国-瑞士自贸协定签署，次年生效实施，对促进中瑞双边贸易投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9月，中瑞两国正式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截至今年7月，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已进行两轮，双方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贸易便利化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至2024年，中瑞双边贸易额从435.7亿美元增至627.8亿美元，增幅达44.1%，年均增速4.4%。截至2025年上半年，瑞士企业累计在华投资项目超2500个，实际投资额

超110亿美元。同期，中国对瑞士直接投资存量达28.7亿美元。

“有了自贸协定的谈判路径和方向，我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很大概率能取得成果。”崔洪建说，“当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施行保护主义时，中瑞如果能进一步坚持自由贸易、公平开放等原则，就能发挥很好的示范效应。”

瑞士联邦议会联邦院议长安德烈亚·卡罗尼曾在采访中公开指出，瑞士在双边层面推进与中国自贸协定的升级与现代化的同时，也在多边层面向世界传递明确信号：自由贸易能够进一步提升、不断深化，而非像全球一些地区那样陷入倒退。“中国积极地支持加强多边主义，这与瑞士的立场完全一致。”

今年适逢中瑞建交75周年及“中瑞文化和旅游年”，中国驻瑞士大使钱敏发文表示，伯尔尼中国文化中心已正式揭牌，搭建起两国人文交流新平台。双方将举办一系列音乐、艺术、文旅活动，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筑牢中瑞人文

友好连心桥。

“人文交流有自身独特的价值，不论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出现何种走向，中瑞、中欧之间都应该积极推进人文交流。”崔洪建分析说，“因为一旦做好了，就能有很长的持续性，也会对其他层面产生积极影响。”

对欧政策需差异化破局

近年来，受俄乌冲突等第三方因素的干扰，中欧关系遭遇一些挑战，但仍保持频繁交流，各领域合作也在加快推进。

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今年上半年以来，中欧高层互动以“务实合作”为主线，在经贸、气候、立法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崔洪建认为，下半年的交流重点可能更多聚焦具体国家。“从外交的互动频率上，也能体现出中方的一贯态度，即始终将欧洲作为主要的外交方向之一。”

在崔洪建看来，欧洲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中方在对欧政策上应采取差异化策略。“真正能和中方开展实质性合作、实现共同利益的，主要还是来自国家层面。”

基于这一点，崔洪建指出，“对欧政策要有耐心和定力，既要有明确的目标，也要有对于目标实现路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充分估计，不能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目前需要的是牢牢抓住欧洲国家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我们的经济体量足够大，适应力足够强，是可以和多样化的欧洲国家发展出丰富的合作关系的。”不过，在欧盟机构层面，特别是政策、舆论或规则等方面，崔洪建认为“也要做好长期对话和周旋的准备”。

中欧关系砥砺50年，双方建立了多个交流对话机制，但在国际局势变幻交织的当下，在坚持务实合作的同时，“对现有机制进行更新、调整也非常必要。”崔洪建说，需要根据外部形势和中欧相互需求的变化，对现有机制进行更合理的调整，以聚焦合作、突出重点并提高效率。

本报北京10月9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马子倩
记者 陈小茹

随着10月4日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出炉，64岁的日本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成为自民党成立70年以来首位女性总裁。接下来，她大概率将在10月15日举行的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接替现任首相石破茂，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

和高市早苗创造历史的“荣耀时刻”相比，面对日本政坛“五年四相”的恶性循环，国际舆论更关注高市早苗能在日本首相的位子上坐多久。日本是中国重要邻国，今年又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一向主张对华强硬的早苗即将就任日本首相，引发各方对中日关系走向的担忧。

“若高市早苗执掌日本政府，中日关系将面临严峻挑战，尤其在历史、台湾、安全等敏感议题上摩擦恐将加剧，政治互信下降会波及人员与经贸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静静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鉴于中日经济高度互依、区域合作机制的存在及日本国内对稳定对华关系的现实需求，双方仍有望在经贸、环保、多边事务等领域维持有限且务实的合作。

关键考验刚刚开始

今年是高市早苗第三次竞选自民党总裁，此前她曾在2021年和2024年两次参选但均败选。此次高市早苗距离日本首相之位仅更进一步之遥，但因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国会众参两院均失去多数地位，且日本未来两年内没有全国大型选举，这意味着自民党在国会的“少数执政党”地位不会发生改变。因此，高市早苗能否在预算、人事、立法等议题上获得在野党支持，将成为影响其个人执政稳定的关键因素。

“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合执政至关重要。”10月4日，高市早苗在当选后的首次记者会上透露，她在胜选后立即与公明党



视觉中国供图

党齐藤铁夫举行了会谈。同时，若能具有基本共识的政党达成一致，组建执政联盟是可取之举。

不过，在陈静静看来，高市早苗执政前最充满结构性挑战。政治层面，执政联盟脆弱，易成“跛脚政府”；公明党明确表示仅与“中间保守派”合作，若高市早苗质疑推进修改“和平宪法”、大幅提升国防预算等激进议程，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恐有破裂风险。社会层面，日本经济受大米涨价和美国关税冲击，缺乏增长动力，政府债务居高不下，财政风险攀升。

此外，高市早苗社会立场保守，反对同性婚姻、夫妇别姓和女性天皇，强调女性应“相夫教子”。此类观点虽能拉拢传统选民，但可能流失年轻群体和都市中间阶层的选票，增加未来大选败北风险。陈静静认为，对高市早苗而言，“首位女首相”这一标签产生的性别象征效应有限。

“高市早苗既可能凭借保守派整合与性别符号建立稳定政权，也可能受少数反对党、经济困局等因素影响迅速下台。未来6-12个月的预算审议、地方选举及中美日三方互动，将是检验其能否打破日本首相‘走马灯魔咒’的关键考验。”陈静静

分析说。

经济政策暗藏危机

在此次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早苗在首轮投票落后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16张议员的票的情况下最终实现逆袭，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分析高市早苗逆袭原因，陈静静认为，一是自民党内保守派对高市早苗支持稳固，作为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忠实拥趸，高市早苗获得原“安倍派”约四成成员的支持，并赢得“麻生派”的公开背书。此外，高市早苗还吸引了20余名因不满石破茂“中间路线”而倒戈的原“岸田派”议员，形成了“老保守”与“新激进”组成联盟的局面。二是高市早苗部分政策主张契合了特定群体的需求。她以“安倍经济学”为基础提出“早苗经济学”，主张为了经济发展允许增发赤字国债，强调积极推进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强化产业保护和限制关键技术外流，这些主张赢得了保守派、中小企业主及低收入群体的支持。

高市早苗胜选后，日本金融市场上演剧烈震荡，股市获得短期动力，但日元汇率

承压明显。《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当前日本债务规模已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0%，若继续财政扩张甚至增发国债，容易引发金融风险。陈静静指出，长期债务高企可能引发日本信用评级下调、利率攀升及财政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一旦全球流动性收紧或者通胀居高不下，当前刺激政策或将迅速演变成债市与汇率的双重危机。

中日合作空间仍存

10月1日，高市早苗曾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署名文章称日本在外交层面应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继承了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10月4日，她在记者会上重申这一外交立场。

据日本《读卖新闻》10月3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0月27日至29日访问日本。届时，日美两国领导人预计将重申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的相关承诺，并就关税问题、对华政策展开协调。

“高市早苗的外交需在中美间谨慎考量。若高市过度迎合美方对华遏制战略，可能会牺牲日本的经济利益与主权独立；若对美态度强硬，则可能动摇日美同盟这一安全基石。”陈静静观察到，高市早苗的外交政策也展现出一定的战略自主倾向：一方面，不排除重新就日美关税协议展开谈判，以回应日本国内对美方高关税政策的不满；另一方面，在半导体和关键供应链等领域，高市早苗强调日本在国家安全与产业安全方面应具备独立判断能力。

陈静静认为，高市早苗的对美政策将成为其对韩和对华政策的“主轴”，可能形成“美日韩同盟、日韩推动协调、对华战略竞争”的总体格局。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高市早苗必须在意识形态偏好与现实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其政策空间仍

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

来自日本冲绳的北京工业大学日本籍讲师大城尚子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日本应追求有效外交和与中国等邻国的持续对话，以促进相互信任、纾解社会痛点。

“在北京的生活让我深刻体会到，这里的技术与专业经验具有广泛适用性，可以契合冲绳这类小型岛屿的发展需求。”大城尚子说，“理解并尊重大陆国家与岛屿地域的视角差异，寻求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我们既能在当代深化纽带，又能共同传承悠久的历史渊源。”

一段时间以来，中日关系呈现出积极改善态势，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中日高层经济对话等交流机制得到恢复，双方也通过放宽签证限制推进人员往来便利化。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数据显示，刚结束的国庆中秋长假期间，日本是中国游客境外旅行酒店预订量最高的目的地，也是仅次于韩国、来华旅游人数最多的第二大客源国。

“中日经济合作的基本盘依然稳固。”陈静静表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重要的技术与投资来源地。日本经济界普遍希望维持对华合作，尤其在汽车制造、电子零部件、绿色转型、养老产业等领域，双方互补性显著。即便高市早苗在意识形态上立场强硬，也难以忽视这一经济现实。

陈静静特别提到，中日在绿色领域具备合作潜力，双方在碳中和、绿色技术、海洋塑料治理等方面已有合作基础，可能成为高市早苗执政下的合作突破口。“政冷经热的历史经验可能重演。若高市早苗执政，或将面临来自国内经济界与官僚体系的制衡，其强硬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可能有所缓和，从而为中日经贸合作保留一定空间。”

本报北京10月9日电

冲突延宕两年：硝烟难散 加沙伤痛难愈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以色列与哈马斯均已签署其提出的“20点计划”第一阶段协议。

当地时间10月9日凌晨，卡塔尔外交部部长阿萨里通过社交平台表示，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及执行机制已达成一致。这将促成冲突结束，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与巴勒斯坦在押人员获释，以及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各派别同意加沙停火协议，呼吁特朗普及担保国确保以色列执行加沙停火协议。

另据外媒报道，正式协议将于当地时间10月9日12时在埃及签署。该协议包括立即开放加沙地带5个过境点，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调整以军加沙撤军路线图，在第一阶段释放20名活着的以方被扣押人员。协议由美国、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担保，“只要双方遵守协议，袭击就不会再次发生”。

哈马斯与以色列10月6日起在埃及城市沙姆沙伊赫进行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谈判以间接方式进行，由美国、埃及、卡塔

尔和土耳其居中斡旋。据埃及开罗新闻电视台报道，10月6日的谈判重点是尽可能进行的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与巴勒斯坦在押人员获释“打好基础”。10月7日，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谈判继续，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和以军撤出路线是当天谈判的重点议题。哈马斯方面则提出两大要求：一是以色列永久结束对加沙地带的侵占，这一点必须得到国际保障；二是将释放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与以色列全面撤军的时间挂钩。10月8日，主要斡旋国家的负责人，例如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等都加入了谈判。

“长期以来，埃及和卡塔尔都对巴以冲突保持密切关注并积极劝和促谈，但9月9日以色列空袭卡塔尔境内哈马斯代表团驻地后，以卡关系急剧恶化。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底公开向卡塔尔道歉，双边关系修复仍需时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在此情形

下，埃及显然比卡塔尔更适合作为本轮加沙停火谈判的地点。

秦天进一步分析说，美国、卡塔尔、土耳其代表团的加入，为本轮加沙停火谈判增加了斡旋和调停的力量，鉴于第一阶段停火协议达成之后的谈判将更加困难，三方加入可以起到攻克谈判难点、防止谈判破裂、担保协议落实的作用。最终停火协议能否有效执行还有待观察。

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加沙停火谈判正值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两周年之际。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0月7日发布的数据，两年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6.7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逾16.9万人受伤。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加沙地带人口约230万。这意味着，两年来，加沙地带每30多人中，就有一人因以色列军事行动丧生。

两年的持续冲突令加沙地带陷入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房屋被毁，公共基础设施瘫痪，大多数医院被迫关闭，饥荒……以色列在战争中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国力消耗，



2025年10月7日，加沙城，以色列持续推进军事行动，伊斯兰大学附近浓烟升起。视觉中国供图

国内反战情绪渐涨……

有分析指出，本轮巴以冲突在过去两年间愈发严峻，与美国对以色列的“纵容撑腰”等因素密不可分。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始终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立场，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外交上，美国屡次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挠加沙停火努力；军事上，美国持续向以色列输送武器，加剧局势紧张。埃及战略研究中心副

主任穆罕默德·易卜拉欣·达维里表示，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意在让以色列成为中东事务的支配者，从而服务美以共同利益、维护美国霸权。

此外，本轮巴以冲突带来的深重灾难，也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深刻思考。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10月以来，荷兰、保加利亚、英国、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多国民众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活动，抗议以色列对加沙的持续军事行动及其造成的人道危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加沙停火的实现，并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科威特大学研究员穆罕默德·巴德里表示，为有效应对和解决加沙冲突等严重危机，相关各方应尊重各国主权，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回到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轨道。此外，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本报北京10月9日电

观察

□ 赵安琪

在美国中西部的田野上，豆农正在仓促收割大豆，但笑容比往年少了许多。美国伊利诺伊州沃特曼镇农场主瑞恩·弗里德斯说，他不得不把大部分收成存入粮仓，因为卖掉就意味着亏损——每英亩亏64美元。这是他种植生涯中艰难的一年。

豆农的这场危机，始于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上台后，肆意挥舞“关税大棒”，试图以“贸易保护”重振美国制造。然而几个月过去，这场关税战的回镖精准击中美国自身，尤其是那些曾被特朗普视为“核心选民”的农场主，正深陷困境。

在全球大豆贸易中，中国曾长期是美国最大买家。美国大豆协会数据显示，过去5年中国平均进口了全球大豆贸易供应量的61%，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2024年，美国对华出口近2700万吨大豆，而今年，大豆丰收了，但中国订单并没有如期而至。美国政府数据显示，受特朗普关税政策影响，截至秋季收获前（1月至7月），美国对华大豆出口量同比下降39%，至590万吨，出口额下滑51%，仅为25亿美元，农民因此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我们迎来了预期的大丰收，却失去了最大的客户。”美国伊利诺伊州农民罗恩·金德里德无奈地说，如果不尽快与中国达成协议，他们将看到价格跌入谷底。

事实上，大豆“断供”危机已令美国豆农陷入双重压力：一边是大豆价格暴跌、现金流断裂；另一边是化肥、燃油、运输等成本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农业萎缩也引发了更深层的连锁反应：农机制造商CNH公司上半年农业业务净销售额同比下降20%。首席执行官格里特·马克斯在农机展上表示：“只有中国重新下单，才会有好消息。”这番话揭示了美国农业产业链的现实：从农民到设备制造商，从运输到仓储，几乎所有环节都已被关税战裹挟。

对这场愈演愈烈的农业危机，特朗普政府宣布将拿出部分关税收入对农民进行援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称将公布新的农民补助计划，金额或超过100亿美元。特朗普对农民的偏爱并非偶然，农业州是特朗普的政治票仓。然而，如今的救助计划，虽能在短期内缓解农民的资金困境，却无法改变结构性问题。特朗普的补助逻辑很简单：关税让农民受损，用关税收入补偿他们。但问题在于，其他同样被关税击中的行业，却没有被纳入救助范围。

特朗普的关税措施覆盖金属、机械、电子、食品等多个领域。以酒类为例，美国加州葡萄酒协会的数据显示，受关税政策影响，今年美国葡萄酒出口下降了30%；美国蒸馏烈酒协会的数据显示，对加拿大的烈酒出口暴跌了85%。美国威斯康星州啤酒厂主基斯汀·特尔比斯特说，因为铝罐、大麦到品牌周边商品的供应纷纷涨价，导致生产啤酒的成本飙升了约40%，他不得不关闭啤酒厂。他也承认，政府要为所有受影响的企业提供广泛援助几乎不可能，毕竟受波及的企业数量庞大，但他仍感到不公平。“我们如今的处境，并非源于正常的市场因素，而是政治代价。”

美国“小企业联盟”发言人亚历克西斯·达马托表示，她所在的组织并不反对政府向农民提供援助，但“我们不同意在这场关税战中人为划分赢家 and 输家”。

这些声音揭示出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核心矛盾：当一个以“保护美国制造”为名的关税政策，必须靠“纾困”才能让受害者勉强存活时，它已经偏离了经济逻辑，沦为政治操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的援助资金仍来自纳税人的口袋。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财年美国财政收入约21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关税成本最终仍由消费者承担。换句话说，美国人先为关税埋单，再为救助埋单。

特朗普不久前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称：“中国出于谈判目的不买美国大豆，农民受罚，但最终他们会受益。”然而，这种“最终受益”的承诺，如今显得苍白。

关税或许的确在某些时候能制造政治声势，但无法改变全球贸易的结构。美国豆农的仓库堆满未售的大豆，美国企业主关闭车间生产线，这些不是战略胜利的标志，而是政策反噬的代价。当特朗普政府试图用关税筑起壁垒、用救助平息怨气时，真正被稀释的，是美国经济的韧性与合作的公信力。

曾经，“美国优先”被用来描绘一个强大的经济愿景。如今，在救助争议中，它更像是一场自我制造的困局。

特朗普关税豪赌砸了谁的饭碗